

天际……

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太阳，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，歌当哭，激扬文字。王船山如南，天地元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。

王船山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，洞庭之

时光流逝，光阴荏苒。

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四海初宁，内政修明，海外藩邦来朝，盛世气象初显。

是年农历八月十六，月满中天。长沙城内，提督湖广学政署内一方雅舍，轩窗半掩，几竿湘竹在夜风中摇曳。

潘宗洛独坐书斋，铺开宣纸，蘸墨挥毫，写下《船山先生行述》，称船山先生“以文章莫妙于南华，词赋莫高于屈宋……自明绝祀，先生著书凡四十年而终”。

翌日傍晚，王散读罢此文，泪流不止，颤声道：“大人前有‘样范二十’刻于先父墓前，今又亲撰先父‘行述’摹其坎壈、彰其事功，先父泉下有知，当领首矣。”

虎止先生，汝入为幕僚，既为吾门效命，更为邦国分忧。”潘宗洛正色道：“船山先生毕生文字，皆心血所凝。其志节乃湘岳之逸也，真砥柱一代伟人矣。”停了停，又道：“先君大人浩气长存，其德性如南岳之松柏，才情若湘水之波澜。吾学浅陋，难探其奥，只述其实。若后学见吾所述，知先君之志节，研济世之经学，得万世之太平，虽千载以下，亦不虚誉也。”

早在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正月十八，广阳学派代表人物刘献廷游南岳，得识船山先生，十分推崇。后来他在《广阳杂记》中赞船山先生：“其学无所不窥，于六经皆有发明。洞庭之南，天地元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耳。”

嘉庆年间，理学大师唐鉴在《国朝学案小史》中对船山先生学问给予高度肯定，认为“先生理究天人，事通今古，探道德性命之原，明得丧兴亡之故……先生之道，可以奋乎百世矣”。

潘宗洛、刘献廷、唐鉴和王散及其家人的传承与努力，为乾隆时期船山先生四部著述编入《四库全书》打下了基础。

然而，那些承载着王夫之万丈雄心的文字，其巨大的光热与风雷一直隐匿于黑暗，在故纸堆里寂寞生灰，难抵人间烟火。直到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叫邓显鹤的人出现，这个“灰布仕进”的人，一生只做过从七品的小吏。因际会，他通读了王夫之七世孙世俊之父王承佺广搜庋藏之遗书，认为船山先生“志行之超洁，学问之正大，体用之明备，著述之精卓宏富，当与顾亭林、黄梨洲、李二曲诸老相颉颃，而世鲜知者”，遂排除万难，发愤刻印，务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。

由于工作量太大，邓显鹤请左宗棠、左宗植兄弟帮忙校稿。

两年后，《船山遗书》在长沙出版，称为王氏守遗经书屋版。此版共收船山阐释四书五经的经部著作18种，151卷，外加《读通鉴论》31卷。

这是船山著作第一次系统编校出版。

邓显鹤在《船山著述目录序》中郑重写道：船山先生“生平论学，以汉儒为门户，以宋五子为堂奥，而原本渊源，尤在正蒙一书。以为张子之学，上承孔孟之志，下继来之失；如皎日丽天，无幽不烛，圣人复起，未之能易”。

山雨欲来，风云激荡。魏源读了《船山遗书》，五体投地；其“精义卓识，往往暗与之合，左采右笔，触处逢源，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”。魏源高举船山先生的变革大旗，于沉沉夜空中发出一声呐喊，投下一一道闪电：“师夷长技以制夷。”

作为胡林翼的岳父，又是左宗棠的亲家，陶澍亦读了《船山遗书》，他震惊之余，挥笔赞叹道：“天下士非一乡之士，人伦师亦百世之师。”殊为可惜的是，该刊本毁于兵燹。

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初秋，太平军围攻长沙。

左宗棠、左宗植兄弟与郭嵩焘三人逃往山中。左氏兄弟携带一套王氏守遗经书屋版《船山遗书》，每日研读。船山先生痛晚明学术之空疏，直刺上蔡先生、象山先生、阳明先生之心学，批其袭禅宗之皮毛以入儒，窃佛老之土苴附会，以致邦国倾覆，宗社丘墟……激发左氏兄弟雄心。左宗棠后来抬棺出征之壮举，就是受到船山先生的精神感召。

郭嵩焘从左氏兄弟处借得《船山遗书》，如获至宝。他读后顿觉醍醐灌顶，认为船山之学发伏羲、周文王、周公和孔子诸论之道，得“汉宋诸儒俱退听”，承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和朱熹之理学，终成“元明两代一先生”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咸丰壬子避乱山中，有终焉之志，读船山《礼记章句》，寻其意旨。”

在山野深处读了两年的《船山遗书》，郭嵩焘蓄势待发。出山后，他成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重要助手。早在一年前，彭玉麟加入湘军，成为水师领头人。郭、彭二人，都是船山思想的忠实拥趸。特别是彭玉麟，当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未遂之际，彭玉麟独立船头，慨然道：“今日，我死目也。吾不令将士独死，亦不令怯者独生。”语毕，率一营冲入太平军炮火中，力挽狂澜。

事后，曾国藩问此勇何来，彭玉麟答曰：“船山先生之‘活埋’也。”

曾国藩大赞：“书生从戎，胆气过于宿将，激昂慷慨，有烈士风。”

武

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6月18日凌晨三点，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发来的一份急电，大意是：天京已破，城中逆首尽擒斩。再有两日，就可“剿洗净尽”。

自两年前冬，曾国荃率湘军合围金陵，迄今已历七百余日。

曾国藩阅后长舒一口气，当即决定：加快《船山遗书》的刊印工作。一直以来，曾国藩心仪船山先生，认为其是“命世独立之君子”。曾国藩祖籍衡阳庙山，与船山先生为同乡，又都曾求学岳麓书院，亦曾就读过邓显鹤印制的《船山遗书》，深受其益。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孟春，金陵本《船山遗书》付梓刊行。曾国藩亲为校讎，曾国荃资以刻资。金陵本《船山遗书》凡56种，322卷。

绝学重光。较之王氏守遗经书屋版，此次刊印，更为全面。

曾国藩在序中将儒家正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作了梳理，认为道统以孔孟始，经西汉经学家戴圣、北宋大儒张载承继，最后以船山先生终。孔孟以“仁礼”奠定根基，戴圣《礼记》传承“礼”，张载《正蒙》赓续“仁”。而船山先生注《正蒙》数万言，释《礼记》数十万言，充分彰显“仁”与“礼”的价值，此乃“纲维万事”，将“拜世乱于未形”。

在湘军将帅会上，曾国藩愤然道：“楚军之勇，得之于《孟子》；湘军之智，得之于船山。吾辈非屠夫，亦非草莽。湘军更非野蛮之军，而为文化之师。”他命各营置《船山遗书》一部，每日卯时诵读，以明忠义之道。

不惟如此，曾国藩深服船山先生不拘汉宋畛域，兼容并蓄，欲承遗泽“开生面”，遂首奏清廷资遣幼童赴美，习“西洋之学”为我所用。

得益于曾国藩巨大的影响力，船山先生去世170多年后，他的锋芒初露、思想“始显”。

郭嵩焘得金陵本《船山遗书》一套，一昧再昧。三年后，他在长沙城南书院内张栻南轩祠旁，修建船山祠，撰写《船山祠碑记》。

参

郭嵩焘去世17年后，他的“王夫之从祀文庙”遗愿得以达成，而与船山先生同入孔庙者，还有黄宗羲和顾炎武。

从祀孔庙，意味着王夫之成为儒家道统公认的传人。而这，距离他驾鹤西去，已逾两百年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终结，值此之时，一进京参加变法运动的年轻人忧心忡忡。

他就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，时年31岁。

谭嗣同把船山先生视为人生导师，曾写《王志》一文，直言自己“私淑船山”。他对《船山遗书》爱不释卷，反复诵读，坦言“迩为学主船山遗书，辅以广览博取”，“凡为仁学者当通王船山之书”，并把船山先生尊为北宋灭亡以来“膺五百之运，发斯道之光”的一代圣哲，其思想具有“空绝千古”的意义。

三年后，因为戊戌变法的滔天巨浪，

这是后人为船山先生修建的第一座祠堂。

郭嵩焘在《船山先生祠位告文》中推崇道：“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，相去七百载，屹立相望。揽道学之始终，亘湖湘而有光。”同时感慨道：“咸以谓两庑之祀，当在宋五子之列，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。”意思是，船山先生应该像北宋五子一样从祀孔庙，可连乡祀都没有得到，实不应该。

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湖南提学使朱道然提出建立“船山书院”倡议，彭玉麟与王之春等人积极响应，在船山先生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“船山祠”创立了书院。

两年后，船山书院正式招收学子。

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在曾国藩的支持下，慷慨捐赠了家藏的《船山遗书》322卷板片，成为书院重要学术资源。

一年后，彭玉麟感慨王衙坪的书院太小，遂独捐银12000两，将书院迁建于蒸水河中的东洲岛，请大名鼎鼎的王闿运担任山长。

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“才气”与“傲气”，给了他“不做清臣，不受清事，来去自如”的特殊待遇。王闿运心安理得，后来受了点气，便怒怼曾国藩，拂袖而去。连同为“狂人”的左宗棠都看不下去，说他不过是个“狂悖之徒”。但这个“狂人”却对船山先生顶礼膜拜，赞其“前朝干净土，高节大罗山”。

他还在船山先生墓前献联，以表敬仰之情：“世臣乔木千年屋，南国儒林第一人。”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郭嵩焘赴任英国前，向朝廷上奏《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》，被驳回。在英国，郭嵩焘无法教化“野蛮洋人”，反而成为“受教之徒”，引起国人不满。回国后，郭嵩焘退出仕途，创建思贤讲舍，墙上挂着大幅王夫之的画像，作为“专祀船山



插画/何朝霞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刘芳

一个王朝的灭亡因为一个人的坚守，被整整推迟了48年。

在70多年的艰难岁月中，他以难以想象的高格与隐忍，践行了他“明朝遗臣”的誓言，也实现了他“完发身死”的执念。

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钉子，一端钉在明朝的脚心，一端钉在清朝的胸口。

有了这颗强大的钉子，清朝就无法宣称：“天下归顺，四海臣服。”

有了这颗韧性的钉子，明朝就能够发声：“谁言河晏已清明，普天尚有一行人！”

作为强大而韧性的守灵人，他仅仅只是明朝中的一个准八品小官。在漂泊流离的错位生活中，他用卑微但又高贵、普通但又卓拔的坚贞，守望着前朝冰冷的头颅和凄凉的背影。

悠悠孤魂，归之船山。一腔热血，抛入江河。在他逝世十余年后，他的儿子王散终于成了潘宗洛的幕僚，直到此时，王散才真正读懂父亲大人那“誓为文脉续薪火，敢与绝学争徽微”的浩然正气与万丈雄心。

王朝聘给小儿取名“夫之”，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而他在父亲瘦弱的肩膀和千年历史的巨石之上，用毕生的追求、抵抗、挣扎和执念，成就了湖湘文明和灿烂文化史上令人仰望的巍巍“船山”。

他对自己得起“船山”这沉甸甸的三个字。在日复一日的贫困、无处不在的悲苦和漫长孤寂的求索中，他深深感到：天有光，人有气，文有脉。文气要蓄，文心要养，文血要新。所谓蓄、养、新，此三者，皆需静。而他以岳峰为屏，坐于静中，思于静中，冥于静中，化于静中，如此，血气冲顶，万物勃勃。

他以船山为名，恪守忠孝义勇，悲喜自渡，冷暖自知，这是自己的天地。

他与船山为伴，直面日月星辰，通透澄明，灵魂含香，这是自己的世界。

说到底，这座“船山”，既是是他日日凝视对话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自然之山，更是他时时励志警醒“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精神之山。

所谓“船”者，于他而言，装的是家与国、族与民、情与爱；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、改造世界的辩证法；装的是迷离与笃定，是失落与坚守，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决心，是书生报国的执念；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，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，是生命的苦难、孤寂、隐忍以及涕泪交织、悲喜交加的一切。

所谓“山”者，是他的智慧所拥有的宽度，是他的灵魂所触及的广度，是对他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深度，是他留世八百余万古文字所铺就的厚度，是他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精神高度。

这个精神高度，既是王船山穷其一生，用一血一泪、一砖一瓦、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、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，也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、无比热爱、无比感激的灵魂高度。

王船山一生所写的著作无法精确统计，除大量散佚外，仅目前收集到的就有100多部、400余卷，共800余万字，都是他用古奥的繁体字，在泛黄的草纸上一字一句写出来的，每一个字都能读出他的呼吸、脉搏和心跳。这是他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灿烂世界。

一间草堂，著书立说，长歌当哭，激扬文字。王船山如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，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天际。

谭嗣同曾写下预言：“万物昭苏天地曜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

“南岳雷”，王船山之谓也。

“雷神”下凡，天地激荡，其思想的春雨，泽被后人，滋润万世。

1985年，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全球最伟大的八位哲学家，其中四位是唯物主义者，王船山位居德谟克利特之后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前。可见其精神的光芒，不仅照亮了东方，也照亮了世界。

王船山对得起后人对他的崇敬。临终之前，面对来访者潘宗洛关于其书未曾刊行是否遗憾的提问，他掷地有声道：“人有人脉、民有民心、族有族志、国有国运。文脉连血脉，血脉生文气，文气润人心，人心贯文运，文运通人运，人运通民运，民运通族运，族运通国运。是故文脉旺则人旺，文心盛则民盛，文气兴则族兴，文运强则国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高高地昂起头，朗声道：“吾书两百年后始显，吾道五百年后大昌。”

此等宣称，真是雷霆万钧，石破天惊。这是何等的自重，何等的自信啊！

这个被世人称之为“东方黑格尔”的执念者，如激流中的巨石，具万古风流之铮骨。他以一人之孱弱，顶起一个王朝的脊梁；他以思想的王者，承续华夏源远流长的一脉文运……

那是一面大旗，秉持炎帝精神，悠悠苍穹，天健地坤。

那是一束微光，澈亮湖湘文明，莽莽寰宇，山清水白。

千灯船山，万古风流

聂茂

文脉长沙